

“三位一体”综合回应战略

黄方毅

(一) 新技术革命的利弊观

新技术革命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它对发展中国家将形成一种利弊兼有的冲击波。简单地说，其弊主要将在以下方面呈现：

新技术的应用是一种高脑化的劳动过程，需要经过训练，有较高知识素养与技术水平的劳动者，而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目前都不具备；

新技术的开发需要保持能源源不断提供新的知识的智能源，这是不能靠“引进”解决问题的；

新技术的普及需要较高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在组织、管理系统方面，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

新技术的运用将使某些制成品成本趋于低廉，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失去现在劳力廉价的优势，以及凭价廉占据的国际市场；

新技术的发展将替代某些资源或能源，发展中国家会失去现在具有的某些资源或能源优势。

其利将在以下方面展开：

日益成熟的新技术使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必再沿袭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而开辟了一种新选择的可能性；

信息技术等可以部分替代原来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例如铁路交通；

新技术更易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里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因而获得一种新的活力；

新技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大量培训人才，开发智力；

新技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开发落后的边远地区；

新技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其落后的组织和管理；

新技术所追求的社会分散化结构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有先天的相近之处。

人们肯定要问：上述新技术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造成的冲击，如果比较的话，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

我们认为利大弊大的比较，关键不在新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对新技术的回应，在于我们的回应是否得当与足够。换句话说，利大弊大不仅取决于

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是技术性问题的，而是从经济、社会诸方面可能做出的转变中去对它做出一番运用和选择。

(二) 历史的借鉴

分析一下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我国做出的反应是有启发的。十八世纪中叶起产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当时我国正处在所谓“乾隆盛世”的年代里，社会封闭和信息阻塞使我国不能以变革了的外部世界作为正确审视自己的客观参照系，因而恰恰是在我们举国陶陶然于这一盛世年华之际，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却拉大了，当时我国对世界的变革没有做出丝毫的回应。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东侵，战场上洋枪对长矛的较量使一些明智的当权人物获得了一种新的参照系，因而搞了一次洋务运动，造军械购兵舰，以求“船坚炮利”。然而当时我国的回应仅仅局限在个别的技术领域，因而也未使我国摆脱后来的命运。这段历史说明了，对国外发展闭目塞听，置之不理，不做回应是要误国的，而如果仅局限在个别技术领域，或只是以搞一次“新洋务运动”来回应世界挑战，那也是不能成功的。世界对我们的挑战，其含义是深刻而广泛，它在催逼我们做出回答，而且只能是一种全面的回答。对技术的理解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地看，技术仅是一种技艺或技能。广义地看技术则是一种社会的过程或文化的运动。技术的实现取决于准备掌握它的人的素质，也取决于允许它发挥出效率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包括体制和文化在内。因此，实现新技术引进、吸收、消化、开发、创新的真正能够扎根，发芽、结果的过程，应当是一种比技术传授本身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可以区分成技术与产业本身的发展，社会机制的转换（改革）国民素质的提高三个领域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综合回应战略。

新技术革命

(三) 提高我国国民素质

关于提高我国国民的素质问题，我们理解是一个

纵横谈

比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含义更为宽广的概念。它包含着人的体力、智力、观念尤其是精神状态的全面向上的运动。人的素质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环境制造着人，人也制造着环境。任何一次成功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当而且只能是伴随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高的过程，是“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发展包括经济技术提高和社会体制改进，归根结底也是人民群众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今天，如果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下，不强调我国人民群众的素质的提高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那么随着新技术的引入，国外消费模式的影响作用可能引起一种失衡的状态。先进的技术知识变化了的需求体制与旧有的观念，原有的素质之间的不协调甚至是冲突，那将造成社会不安宁以及有些人所谓的“代沟”或者“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一类失常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可能实现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开发与创新的过程，从而发挥它应有的效率。因此提及“国民素质”如同提及“企业素质”一样，是一个比单纯的技术水平或智力开发水平覆盖率要更大的概念，而且它不可能一下子提高。而有赖于多方面的长期工作，在这方面探寻一种可行的体制调整和改革是有益的。

（四）实行社会机制的转换

我们提出的“机制”的概念其覆盖内容比体制似更为宽广些。什么是机制？我们认为是指某种既定的结构（组织）与其具有的某些特定的功能（机能）之间的联系，所谓机制，既包含着它们之间的联系过程的质的规定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受的制约，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机制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现有的技术水平，体制结构，文化及素质态势等综合效应所形成的功能或机能急待转变。所谓机制，主要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包括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认为，我国机制转换主要应有下述四方面的内容。

1. 由重物资开发型机制向重智力开发型机制改换

现实情况是，我国经济大幅度起步是在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物质资源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物质资源固然重要，但智力资源却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穷不是首先穷在物质资源上，不是穷在资金上，不是穷在设备上，而是穷在人上，穷在具有一代技术知识、精神文明和精神状态的人上，穷在人的智力的

开发和利用上。对我国来说，抓住制约发展的最大包袱——庞大的人口作为战略的突破口，据此而出击，不仅扬智力资源潜在之长，来避物质资源稀缺之短，而且化人口数量庞大之短为智力资源丰富之长，以实现十亿人民“脑一手”的高度开发为重心来制定一系列有关政策，当是回应世界挑战的重要措施之一。

2. 由人才统制型机制向人才激发型机制转换

我国现有的智力开发水平不高，但即使是现有的已实现开发的智力，也远未能充分全部地形成生产力，运用到发展中。因为我国现行体制对人才的使用主要是统制方法，人才被“统”得死死的，不能因人所长，因事所长或因地所长地使用，而且未能与人们个人的物质利益要求和精神追求有机地结合，从而产生一种追求智力、运用智力的内在动力。事实说明，实行智力开发，首先想到和主要着力的，不是增加教育经费或修建学校校舍。应当是探索建立起一种激励人去寻求知识和使用知识的人才激发机制。以寻求建立这种激发机制为目的去调整和制定一系列的有关政策（如人才流动，允许兼职，兼薪等）则是当务之急。培养人才固然重要，而激发人现有的才能，却更加重要。只有能够激发人才，才可能利用人才，只有善于激发人才，也才可能使人才培养获得源源不断的再生动能，也才可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被一种崇高的目标和内在的需要的冲动所激励着的人，而这才是一国的精华所在。

3. 由规模型机制向效益型机制转换。

衡量经济实力的标准是在变化的。在当代，有活力的经济不是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小，而是在于其经济效能的发挥，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与迅速形成与变换自己生产的能力等方面，这就要从观念上由以前追求“愈多愈好，愈大愈好”的规模型经济转变为追求效益的效益型经济。现在国外提出“反生产力”的概念，认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妨碍或削弱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或因素，消除这些环节与因素本身即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传统战略影响下，我国经济中科学—技术—教育—生产等重要环节彼此脱节，一般生产力不能转变成现实生产力，正是在追求规模不断扩张中掩盖着既定规模下的效益不能发挥，妨碍着去消除所谓的“反生产力”尤其是由一般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障碍。相反，只有追求效益即建立效益型机制才可能在经济内部建立起追求新技术的内在需求力。

4. 由封闭型机制向开放型机制转换

我们理解，中央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就是要结束我国社会的长期封闭状态。这种封闭

的结果是落后。实现开放政策，首先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角度，一种得以开阔自己视野，正确判断自身的参照系，从而在观念上首先解放出自己，这才可能参加到世界性的竞争中去。实行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国外开放，而且包括着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以至个人的开放。只有开放，才能不断在新的视野和观念下去吸取新的知识技术。因此，开放又同智力开发联系在一起。

前述的四种机制转换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种人才激发型机制就不能倚重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不建立起一种追求效益型的机制又不能去建立这样一种人才激发型的机制，而不建立起开发型机制，就不能提高效益，然而真正实行开放又同智力的开发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同侧面上的机制转换又形成了一整套机制转换的良性循环。只有在实现机制的转换之中，我国的技术与产业才能得到发展，素质才能逐渐提高，从而全面地回应世界挑战。

(五) 兼顾的产业政策与四阶梯新技术逐层推进开放体

我国现在是一种多种产业并存的多层次产业结构。从这一现实情形出发，我们主张兼顾的产业发展政策，发展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的资本密集产业使之得到发展，并相应保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有的产业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在这种过程中实现我国智力资源的开发，实行现有经济机制的转换，是比较现实而稳妥的。

当然，对我国来说，建立新技术产业、发展新技术来改造传统的产业部门是当务之急，对国外已经成熟的新技术，应当放开手脚地大胆实行“拿来”，在拿来的过程中去发展我国自己的基础研究，即在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去从事开发和创造，这比首先自己从事基础研究，再实行“拿来”要现实得多。

为此，我们建议，建立起一种四阶梯的新技术逐层推进开放体。

第一阶梯设在海外。不仅我国要对世界开放，世界也要对我国开放。不仅要引进新技术，而且要出去直接吸收国外的新技术以建立新技术流向我们国内的“热线”。具体措施可以考虑：开设我国投

资的多国公司；支持海外华人或华裔开办以新技术为内容的公司；允许并鼓励我国在国外的留学生结束一段时期的学习后开办以新技术为主的公司企业。这样把我们吸收新技术的阵地直接推进到海外，以有利于追踪新技术的发展，减少技术传播所需的时间和信息损耗。

第二阶梯设在我国沿海地区。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允许建立特区。将特区和沿海办成我国的高技术密集和高智力密集地区，形成接收新技术的前沿地带。

第三阶梯在城市。在本城和市区应当允许科技人员与一定程度的知识份子兼职兼薪，接受外单位的研究、教学、咨询任务，以实现人才的部分流动为第一步，逐步向人才的完全流动过渡。同时，应当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和老技工开办各种类型传授知识与技艺的学习班，还应考虑允许城市居民自己筹资建立营利性的“知识—技术开发体”，以培训人才、研究课题和技术咨询活动为内容。尤其应当鼓励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将知识技术扩散到农村，接受农村的聘职或兼职。

第四阶梯在村镇和农村。我国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在农业体制改革已获得巨大成效的当前，把科技发展引向农村，是引导农业发展深入的新的有力因素。我国农业从根本上不能走发达国家迄今的石油农业的道路。新技术革命中的生物工程为我国未来的农业发展，开辟了获得广阔前景的新的可能性。应当鼓励和支持农民集资开办与新技术有关的企业，鼓励和支持农民集资开办“技术开发与人才培养联合体”，招聘城市人员去传授知识技术，以开发农村的智力资源，为未来新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较早地打下一个稳定的基础。放眼未来，如果21世纪头几十年内新技术革命普遍开花结果之时，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能够结合到那时的世界技术变革潮流中去，也就是说，我国传统农业的改革势头一旦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汇合之时，那无疑将是我国经济发展面貌得到彻底改观，新经济模式的朝阳光芒四射之日。那一天来到时，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全人类的贡献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敬告读者

由于纸张和印刷费用调价，本刊从本期起改革版面，每期由56面改为48面，主要采用新五号字体，每面由原来42行增至46行，并将增加不定期中心彩色插页。改版后刊物容量基本不变，质量将不断提高，特此敬告读者。

本刊编辑部